

# “小村规”撬动“大治理”

## ——村规民约促进乡村善治的“广州经验”

□战伟龙

2021年12月25日-26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妥善解决农村矛盾纠纷,维护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健全“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抓手。依托广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第三方评估项目,近年来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持续动态监测广州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和成效。在社会结构转型,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代,作为全国超大城市的广州,如何修订、优化和提升村规民约,从而以“小村规”撬动“大治理”,探索可提供重要借鉴的经验。

### 重视“地方性道德知识” 寻求乡村伦理的“历史之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重视“地方性道德知识”作为“历史之根”在激活乡村伦理基础上的资源意义。

村规民约源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村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进行的制度创设,这种“隐形的制度”逐渐被内化为村民自身的行为习惯,催生出勤勉尽责、信任互助的“为人的哲学”,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成为传统村庄共同体的伦理基础。

村规民约在珠三角地区也有深厚而独特的历史渊源,明代礼制改革以来,广东士大夫生活实践的《乡约》、丁积的《礼式》、黄佐的《泰泉乡礼》等乡约文本,在地方推行礼仪与教化,“倡读书、整衣冠、禁赌博”,华南乡村由此“移风易俗”“焕然一新”。如今,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乡土伦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构建不失乡土本色又蕴含现代价值的“新乡土伦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要求。“新乡土伦理”终究脱胎于传统乡土伦理,因此绝不

能采取与传统“决裂”的态度,反而更要重视“地方性道德知识”对激活乡村伦理基础的资源意义。

村规民约正是利用“地方性道德知识”,嫁接“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重要载体。借助滕尼斯的理论分析框架,构成本质意志的本能的、中意、习惯、记忆,成为中国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认知基础。在番禺区大岭村,村规民约就有选择性地保留了陈氏祖训的部分内容,“克勤克俭,毋怠毋荒;孝友睦姻,六行皆备……”这些延续至今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通过村规民约的接续与活化,仍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生产、生活和精神活动的同质性所形成的强烈的集体意识构成传统乡村共同体的秩序基础。这种集体意识渗透在日常生活动中,并通过各种礼俗、仪式等对成员的仪式和行动产生直接的规范和限制作用。因此,广州村庄保留下来的村民民俗资源,如修族谱、祭祖等节庆仪式、醒狮、划龙舟等文娱活动,也被充分纳入到村规民约的制定内容中,如白云区白山村的“抬菩萨”、花都区塑头村的“灯笼会”、平岭头村的“烧禾楼”……这些集体活动成为团结个体的纽带,村民的群体亲密性得以提高,并借此激活岭南乡村社会内生的互助互爱文化传统,构建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

### 顺应变革的时代需求,化解乡村治理的“现代之困”

毋庸置疑,现代化的发展为乡村社会注入了开放、平等、变革等鲜活的时代价值血液,却也为现代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与挑战。定位为超大城市的广州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大力推动城区人口向新区、郊区适度集聚,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趋势明显。

据广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广州市七个涉农区(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从化区、增城区)流动人口比例进一步增加,白云、黄埔甚至超过半数。在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广州进一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充分顺应时代需求和本地居民的生活脉络,立足人口加速流动的现实背景,推进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法规及城市发展策略之间的良性互动。

### 遵循“因地制宜”的实践原则,“与时俱进”提升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乡村善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勇于实践。

从微观来看,广州市下辖七个涉农区由于自然条件、历史背景、产业结构的差异,各村不仅存在文化资源禀赋的差别,其集体经济收入也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基层治理需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进的差异化、精准化、精细化。

村规民约要紧跟时代、紧扣民心,灵活调整,才能落地生根,取得实效。广州自发《进一步修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通知》以来,各区各村相继完成了新一轮的村规民约修订,增添了不少新时代元素。例如将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垃圾分类等内容写入,引导和帮助群众树立环保意识;制定涉毒处罚措施,把禁吸、禁种、禁制、禁贩等纳入其中,发动村民参与防、禁、查、控;将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与常识要点写入,如禁止滥吃野味、无害化处理死禽死畜等,推动配合支持疫情防控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将村干部管理

首先,将流动人口纳入到村规民约的制定考量中,保障外来人口同样享有分红、补贴福利,同样享有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与集体活动的权利,促使外来人口从“漂泊的异乡人”转变为“扎根的新村民”。增城区东山村专门建有外来人员生活区,其村规民约也规定外来人口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同样享有相应的福利;南沙区同兴村因进驻了珠江啤酒厂等知名企业,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在此打工,故专门在村规民约中设置了出租屋管理的内容,村规民约规定开展的公共娱乐活动、敬老活动都会涵盖外来人群。

其次,通过完善村规民约的出台程序与监督机制,包括在制定时要按照“四议两公开”的制度化民主流程,要经过专业法律人员的审定以确保不与

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等,违反法律法规、损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内容要及时修改,不符合群众利益和意愿、不利于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要及时删除。

最后,村规民约的内容更加聚焦村民的现代利益诉求,借助公共空间与公共组织建设打造“熟人社区”,降低村庄成员自身的孤独感和陌生感,化解信任危机与道德冷漠问题。黄埔区送下村近年来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村规民约号召村民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优化公共空间环境,借助村规民约宣传助农综合服务中心等交流场所与互助平台,提升村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以开放、平等、共享的基层公共性再造来更充分地保障人民择地安居的自由,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办法写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营造良好的基层政治生态。其次,针对目前村规民约条文繁冗,不利于村民提取有效信息的问题,不少村庄都对村规民约进行了“瘦身”,如白云区岗尾村就将村规民约从冗长的63条简化为24条,在保证大方向不变的基础上,规定更加人性化、民主化。部分村庄的村规民约则有两个版本,村委会将贴近村民生活、村民较为关心的条例单独宣传张贴,同时针对常住人口的实际情况进行入户宣传,从而强化宣传效果。

实现乡村善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要重视“地方性道德知识”,接续利用传统资源,顺应变革的时代需求,聚焦村民现代利益诉求,遵循“因地制宜”的实践原则,与时俱进提升治理效能,方能赋能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暨华南农村研究中心)

###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 从卫生健康共同体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维度

□武春丽 刘小龙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21日晚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健康峰会并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就全球抗疫合作提出了中国主张的“五个坚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施策,统筹系统应对;坚持同舟共济,倡导团结协作;坚持公平合理,弥合‘免疫鸿沟’;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治理体系,坚定不移推进抗疫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必然逻辑和具体体现,旗帜鲜明地凸显了中国应对全球疫情的价值理念、政策主张和治理方略,在价值维度上与美国文明新形态具有同构性,为探索人类文明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 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人类文明挑战的中国方案

疫情的暴发不只是反映了生态建设面临的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一种系统性危机乃至人类文明的危机。如何应对疫情,不仅仅反映了一种制度体系的当下选择,实际上也是对“人类走向何方、人类未来如何”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以开放、平等、共享的基层公共性再造来更充分地保障人民择地安居的自由,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大考验,中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中的不同方案,呈现出的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揭示了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巨大差异。面对疫情,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秉持资本至上的价值立场,宁愿牺牲民众生命,也不愿让资本利益集团为巨额防疫物资买单,甚至鼓吹“群体免疫”,更是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虚伪性和反人民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开始就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以及人类文明发展意义的深邃思考而逐步形成的,是对自然发展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集中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追求。

###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丰厚文化涵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存在发展作出的一种批判和思考,把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关系置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规律辩证统一来考察。以批判资本主义逻辑为抓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贯穿着“人对自然支配统治”的价值取向,导致了“不要过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为此,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必须变革资本主义文明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由资本宰制所主导的政策、规则。

### 卫生健康共同体贯穿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涵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断向前推进的实践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发展的产物,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又蕴含着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语境下提出的应对全球共同难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蕴涵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涵。

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反对政治霸权。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人类是一个有机整体,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不要让政治偏见遮蔽对病毒疫情的客观认知,更不要让意识形态斗争影响了携手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只是基于中国社会形态的特殊性的概括,也是对人类社会形态的一般性规律的理解,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形态探索的中国智慧。“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坚持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过程相连接,体现了它所具有的广泛世界意义及其蕴含人类共同价值理念。

(作者简介:武春丽,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小龙,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

# 理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维度

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洪伟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在2021年10月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提出其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也先后三次提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些重要论断为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遵循。

###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党探索中国式民主政治道路的百年历程与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狭隘性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命题。因此,发展民主,让人民充分享有各种民主权利,既是对既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也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将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追求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早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基本纲领,其中的政治纲领明确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由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一切权力。党在延安时期还确立了民主执政的局部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同时,党还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政

###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基层治理中,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客体“原子化”、治理效果“内卷化”等问题依然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不时出现,严重影响基层治理整体合力的形成。

面对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短板”,党中央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加强重点领域政策

落实落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十九大的基础上再次明确,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十三个方

###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有力回应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当前充斥国际舆论场的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有力回应。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深刻总结,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民主好不好,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其次,民主不是美国及西方的专利,不能只以美国及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坚决反对把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动辄以民主代言人自居干涉他国内政,或者假民主之名,行霸权之实。最后,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也是多样的和开放的,不同政治文明之间需要的是平等对话、交流互鉴而不是对抗。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

### 国际 维度

1989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意味着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更意味着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是所有国家的必然归宿。“历史终结论”成为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对其他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的重要理论依据。这种强加于人的“美式民主”只会带来灾难。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以后,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并借自身地缘政治利益需要,人为地将世界各国区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企图挑起意识形态对抗和世界分裂。这种西方“民主话语霸权”与“中国威胁论”等论调,不时搅动国际舆论场,让中国时常面临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

### 历史 维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狭隘性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命题。因此,发展民主,让人民充分享有各种民主权利,既是对既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也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项目(项目编号:GD20CX02)的阶段性成果。